

施建雄 著

王鸣盛学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施建雄
著

王鸣盛学术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鸣盛学术研究/施建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004-7597-2

I. 王… II. 施… III. 王鸣盛 (1722~1797) —学术思想—研究
IV. B2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370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7.125 插 页 2

字 数 411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其泰

施建雄博士的学位论文《王鸣盛学术研究》业已修改完成，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写篇序文。王鸣盛作为乾嘉时期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至此才有了第一部专门研究他的著作，我感到欣喜，也很乐意在本书前面写上几段话。

乾嘉学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考证之学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达到极盛，名家辈出，考经考史和其他学术门类的考证工作蔚为大观，为后人研治古史和古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他们堪称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也备受尊崇，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鸣盛一生潜心治学近半个世纪，著述丰富，识见过人，一向与同时代的钱大昕、赵翼一同被誉为“考史三大家”，可见他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但是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以往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据我看来，阻碍对王鸣盛学术作深入探讨的原因有二。一是对其学术的特点缺乏深刻、中肯的认识，未能掌握正确的评价尺度，有时甚至只抓住某些小节而心存偏见，不能识其大体，对其学术的精髓视而不见。二是王氏学识渊博，其著述涵盖多个领域。仅其《十七史商榷》即纵贯自《史记》至《旧五代史》

十九部“正史”，时间跨度一千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事件、人物、制度、地理，以至史籍版本歧义、文字错讹、名物训诂等。如果不下长期的功夫去钻研，爬梳分析，反复考论，如何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只据其著作中的若干条目即遽下结论，岂非因小失大，甚至与事实大相径庭。

王鸣盛一生治学的路数是前期偏重经学，后期偏重史学。关于他的学术特点，前人有两种说法。其生平好友钱大昕称他专重考证，“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西泠先生墓志铭》）。而晚清学者李慈铭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王氏《十七史商榷》既钩稽抉摘，精于考辨，又有“议论淹洽”的特点，故“非钱之专事考订者比矣”；并且称誉王氏“多足决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李慈铭之论独具慧眼，真不愧为王氏百年后之知音！然则，王鸣盛本人曾在《十七史商榷序》讲过：“读史者不必以议论为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又说：“书生胸臆，每患迂愚……议论褒贬，皆虚文耳”，是否他真的反对评论历史，与李慈铭所作评语相矛盾呢？这就需要联系王鸣盛所处的学术环境，推求他言之所指，明了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只有联系清代务实学风对宋明理学空谈的批判这一学术背景，联系王鸣盛同时代人的议论，才能明白其中真谛。王氏强调“求于虚不如求于实”，力斥“议论褒贬皆虚文”，乃是有的放矢，是针对宋明以来众多论者所作“史论”，不去深入地分析历史事实的原委，而专凭主观臆断随意发挥，造成极大流弊。故《四库总目提要》直斥这类史论为“百家调语”，“此是彼非，互滋簧鼓”，“凿空生义，僻谬不情”。王鸣盛还一再明确地反对宋代以后学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从理学空谈的羁绊中

摆脱出来的进步趋势。

乾嘉学术以考证学为特征，当日风气所趋，学人争相奔赴。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考证工作，广搜材料，考辨歧误，确有其学术价值；但考证是资料性、基础性工作，在它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工作，即探求史事之因果，评判历史人物之功过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揭示历史演进内在法则性东西等。章学诚于考证之学如日中天之时，即独具慧眼提出应当区分考证功力与思想见识二者的区别，指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见《文史通义·博约中》）对于流行的“考证便是学问的全部”的偏向痛加针砭！李慈铭的评语与章氏相通。前人切中肯綮的论述启发我们：既要尊重考证家搜集材料、排比考订的功夫，更要尊重立言之士推进对事物或社会演进深一层的议论，善于解决疑难的见识。决不能单纯以考证尺度评判高下，而且还要承认，就认识层次讲，正确的见识和论断比起考证功力，在治学上实属于更高的层次。王鸣盛不仅对考证有关事件、制度、地理等项获得丰富成果，而且又能深入一层，对诸多历史问题提出卓见。以这种观点分析，王氏《十七史商榷》的主要价值，更在于表现出注重政治大事和关心民生的史识，并且相当自觉地把“直书其事”作为论史的标尺，而对于一些历史疑案尤其显示出具有博大的眼光。王鸣盛是兼具专深功力和宝贵的识断二者，不唯完全可以与钱大昕、赵翼相并提，而且放在整个乾嘉时期来衡量，也属于特出人物之列。

深入研究王鸣盛学术，除了应贯彻正确的指导思想，真正明了其时代环境与其学术的真谛外，还必须具有迎难而进的精神和毅力。上文已提到《十七史商榷》涉及范围之广，而他的

《蛾术编》和《尚书后案》两部重要著作，前者计八十二卷，内容以论证经义、史地、文字音韵为主，旁及人物、制度、名物、诗文、金石；后者计三十卷，内容是继阎若璩、惠栋之后，对《尚书》今古文真伪问题这一公案再作考论，同样纵贯上下，旁及诸多典籍和各项专门问题，纷纭复杂。作一点形象性的比喻，王氏的三部著作可以譬之为三座山头，以钻研之辛苦和立论之艰难而言，这样说不算过分夸大。必须搬走三座山头，真实、完整、清晰的“王鸣盛学术”的面貌才会呈现于眼前。

建雄博士正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非常可贵的努力。他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采取了新颖的视角，提高了分析能力。因而能掌握好评价的尺度，坚持“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原则，认真爬梳、绌绎，力求获得新见而又评价公允。而对于王氏三部卷帙浩巨的著作，他能发愤努力，深入钻研，逐一解决疑难。他在其攻读学位三年时间，可以说确实做到刻苦用功，锲而不舍，“每天挖山不止”。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可喜的收获。我们翻开本书目录，跃入眼帘的“一个需要超越考据局限去认识的乾嘉学者”，“《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论汉唐之际政治、经济制度之得失”，“地理考辨与探讨政治军事之大势”，“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子学代表作——《蛾术编》”，“小学领域考证的积极成果”，“学术史的贯通研究”，“经学领域的创获——《尚书》研究”，“经今、古文之辨析及对今文家说的采纳”，“钱大昕与王鸣盛——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等——从这些醒目的章节标题，不难窥见作者确实力求以新的视角去作全面的分析、探讨，确实为此项研究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因而吸引读者认真地阅读全书。本书各章的论述，已经怎样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创

新要求，细心的读者在掩卷之余，自然能作出恰当的评价，不用我在此多费笔墨。我希望建雄以本书的出版作为新的起点，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发扬锲而不舍、勇于攀登的精神，能不断地得到新的创获。

二〇〇九年二月序于北师大寓居

目 录

序.....	陈其泰(1)
--------	--------

绪 论.....	(1)
----------	-----

- 一 一个需要超越考据局限去认识的乾嘉学者..... (1)
- 二 近百年来王鸣盛学术研究概况..... (5)
- 三 本书的旨趣和方法 (18)

第一章 社会学术背景与王鸣盛的治学道路	(21)
---------------------------	------

- 一 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特点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21)
- 二 学术背景 (31)
- 三 王鸣盛的经历与著述 (39)

第二章 《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上)	(55)
--------------------------------	------

- 一 论汉唐之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得失..... (57)
- 二 历史地理考证的通识 (80)
- 三 超越考据局限的新视角:地理考辨与探讨
政治军事之大势 (94)

第三章 《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下).....	(120)
-------------------------------	-------

- 一 论汉唐之际的政治与历史人物..... (121)

二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	(143)
三	透过历史著作外在形式的探索:史家思想的 发掘与历史著述功能之探讨·····	(172)
第四章	子学代表作——《蛾术编》·····	(187)
一	典章制度考辨的进一步拓展·····	(187)
二	历史地理考证的深化·····	(193)
三	小学领域考证的积极成果·····	(206)
四	学术史的贯通研究·····	(243)
第五章	经学领域的创获:王鸣盛的《尚书》学研究(上)···	(272)
一	乾嘉以前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考辨·····	(272)
二	王鸣盛辨晚出《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	(281)
三	今、古文《尚书》篇章及传承之考辨·····	(312)
第六章	经学领域的创获:王鸣盛的《尚书》学研究(下)···	(323)
一	《尚书》二十九篇研究的再深入·····	(323)
二	经今、古文之辨析及对今文家说的采纳·····	(343)
三	历史考据法的运用与经文考辨的新发展·····	(359)
第七章	王鸣盛的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	(388)
一	多学科运用的指导思想·····	(388)
二	学术思想的精髓·····	(403)
三	治学方法的特点与不足·····	(420)
第八章	钱大昕与王鸣盛:乾嘉历史考证学的 倡导者与奠基人·····	(461)

一 乾嘉学术思想的倡导者·····	(461)
二 历史考证领域的双峰并峙·····	(467)
三 时代的特点与历史的趋向·····	(521)
 主要参考文献·····	 (529)
 后记·····	 (535)

绪 论

一 一个需要超越考据局限去认识的乾嘉学者

王鸣盛是清代学术名家，著述宏富，治学领域宽广。他的史学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考证、评论了自《史记》至《新五代史》共十九部正史，其中涉及事件、人物、职官、地理、版本目录以至历史编撰等诸多问题，是乾嘉考史的一部名著。书中有关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文字校勘等方面的考辨成果，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著作、历史工具书和史籍整理中均被广泛地采用；更有不少富有思想性的议论和创见，给近现代学者带来有益的启迪，长期以来被视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些都显示出他学术思想的生命力。^① 王鸣盛的经学代表作《尚书后案》与阎若璩、惠栋诸氏所著同在经学史上并称，他对儒家经典《尚书》的辨伪是清代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子学代表作《蛾术编》九十余卷，分为说录、说字、说地、说物、说制、说集等十大类，涉及经义、史地、小学、制度、文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十七史商榷》相发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王鸣盛学术思

^① 陈其泰：《朴学家的理性探求——论王鸣盛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参见《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282页。

想的集中体现。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学术界却长期重视不够。迄今为止,探讨其著作的有价值的文章仅有十余篇,研究专著则付之阙如;现有的文章中,学术价值较高者,也仅限于对《十七史商榷》一书的部分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即使对《十七史商榷》进行全面研究,迄今仍是尚待完成的任务,更不用说对其经学著作《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及子学集大成作《蛾术编》作综合的探讨。学术界有关论著还存在一种情况,即对王鸣盛的考证成果,往往利用得多,而研究、分析得少,更遑论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地梳理。为弥补这个缺陷,笔者力图跨越制度史、地理学、音韵学、文字学、经学等专门领域所存在的实际困难,以王鸣盛的经史三部曲为中心作贯通的综合研究,将其置于相关学科纵向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比较分析,超越以往学术界将王鸣盛仅仅视为单纯考据家的偏颇看法,从更深层次发掘其著述中的思想性内容及历史认识中有价值的论断,进而推动乾嘉历史考证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以考证学家的个案研究作为切入点来推进乾嘉学者思想旨趣及治学方法的分析与总结,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乾嘉学术是清代学术的中坚,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次学术繁荣,并被视为传统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乾嘉学者治学既有总结性特点,又有可贵的创新意识。戴逸先生说:“过去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他们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无征不信,不受权威影响,有独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对《尚书》这样权威性的古书也不迷信不盲从。这种理性精神,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乾嘉学派是从具体方面分析、归纳、演绎,从而达到理性认识……这种认知方法更接近于近代科

学认识”。^① 乾嘉学者自觉地遵守实证的原则，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研究对象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探求其法则规律，因而形成了具有以下特点的研究范式：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较前人而言，其方法更加严密，更具有科学因素。就历史考证学而论，其精深的研究成果也超越了以往史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乾嘉考史三大家各自具有不同的研究特点，钱大昕擅长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进行严格的归纳、分析和推理；赵翼善于从众多的历史材料中发现事物的内在关系，由此提挈或总结出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大势；王鸣盛则兼具二者之长，既重视音韵训诂，强调旁征博引，配合使用校勘、辨伪等一系列方法，又不乏对分散孤立的史料进行钩稽贯串，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进而对诸多历史现象或人物作出合理的解释或宏观的评价。从三位史家身上所表现出的乾嘉学术风格的多样统一，彰显了清代学术丰富多彩的时代风貌。更重要的在于，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同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实证方法有契合之处，因而为近、现代史家所重视，并给予继承和发展。也正因为他们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因而通过相关学者的个案研究进而推动乾嘉学术研究的展开不能不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澄清以往学术界对王鸣盛学术思想认识的不足，并在方法论上给予必要的总结，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鉴戒是本书撰写的另一个目的。过去，一些学者在对乾嘉学术进行研究时，要么因为发现王鸣盛具体考证中存在一些缺失，在未对其考证成果作全面、系统考察的前提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王鸣盛的学

^① 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术成就一笔抹杀；^① 要么出自个人的喜好，局限于以单纯考证为价值评判尺度，对王鸣盛的治学工作肆意贬低。因此，从深层次角度分析产生此类偏颇不实之词的具体原因，不仅能还一位辛勤耕耘却又得失并存的学术名家以公道，而且有助于清除学术研究中主观、片面方法的不良影响。诚然，王鸣盛考证有不够严密之处，但考证工作是相当复杂的，不可能每一条都无比精确，存在一些错误也在所难免。就认识层次而言，博通的见识与考证功力，在治学上不应简单地划分高下。因而，既要尊重考证学家搜集材料、排比考订的功夫，也要尊重立言之士关于事物或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看法，而且在这两方面均有所创获，较仅拘囿于一端，其意义不言而喻。学术贵在创新，乾嘉学者破除习见的勇气以及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努力正是中国传统学术自我更新的一个表现，王鸣盛擅长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恰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和研究方法独具魅力的地方。一些学者严谨过头，拘于成见而对王氏诸多创见缺乏兴趣和正确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z从方法论上进行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论述给予重新评价。此外，在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将其研究对象的学术成就与个人性格的缺失混淆起来，既缺乏看问题的全面性，也不符合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客观态度，在方法论上值得反思。具体而言，王鸣盛因个人有才，少年得志，故向来比较自负，性格上存在缺点，尤其是对他所认为不正确的说法更是不留情面，一些学者因此看不

① 1995年第3期《读书》杂志刊登《点石成金、披沙沥金、脸上贴金》一文，将钱、赵、王形容为龙、虎、狗的关系，说王鸣盛尽往自己脸上贴金，厚脸皮，自吹自擂，并妄下断语，称“《十七史商榷》最多只好算脸上贴金之滥竽”，说：“王氏的盛名多半是他自己吹出来的，读史者不求甚解，也就被蒙住了。”此类言语偏激、态度有欠公允，在相关论述中颇具代表性。

惯，说他好骂人、说话不客气等等，这一点虽然没有必要回避，但我们不能由此将其在学术领域里的贡献一概推翻，这正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汲取的教训。

总之，笔者力图在著述中凸显王鸣盛的学术风格及治学特点，展现其学术研究融符合近代科学精神的精良考证与包含进步观点、新鲜思想的精辟论述于一体的独特风貌；突出他通过严密的考证推翻已被视为定论但缺乏确凿依据的说法而表现出来的创新勇气；彰显乾嘉学术总的历史氛围下王鸣盛治学精神与学术理念的精髓所在，从而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近百年来王鸣盛学术研究概况

18 世纪至 19 世纪前期盛行的乾嘉学派^①，在研究范围上，以经学为中心，而旁及文字、音韵、史地、天算、典制、金石等等；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无论是治经，或者是研史，都重视考证，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以这样的治学范围和研究特点的乾嘉学派，又运用训诂笺释、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目录版本等手段，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各类文化典籍，进行了认真的清

^① 戴逸先生在《汉学探析》中称：“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2集（1982年），第1—2页。

理,使许多残缺亡佚、真假错乱、颠倒讹误、艰涩难读的文献典籍,恢复了本来面目,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与成绩。因此,乾嘉学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应给予历史的分析和评价,而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①王鸣盛是乾嘉学派中的一员,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应与对整个乾嘉学派的认识结合起来,才能从宏观上揭示出王鸣盛的学术思想与乾嘉时代及乾嘉学术发展的内在关系,也才能正确地把握王鸣盛学术成就的具体特点,从而对其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庆彰先生的统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②综观清季以来对乾嘉学派及王鸣盛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49年以前,其中以20世纪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即嘉道时出现的几部探讨乾嘉流派及其特点的学术专著,其中吴派学者江藩编撰的《汉学师承记》最为著名。此书为乾嘉考据群体树碑立传,详尽介绍他们的学术渊源及治学风格,是一位本身就在乾嘉学术氛围中成长并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手段的学者所作的一部具有总结性的经典著作。著者因其学术经历使之对乾嘉学派治学特点把握得较为精准,但也因其自身立场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在评价各个流派时出现厚此薄彼的取向,因而给反对派带来了口实,由此导致另外一部针锋相对的著作——《汉学商兑》的产生。著者方东树专攻考据学的弊端,

① 王俊义:《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见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② 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目录》(1900—1993年),图书文献专刊2,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1995年版。